

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原因

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和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引发了对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的讨论。政治现象的出现背后往往蕴藏着经济动因，这构成个体行动的共同历史条件。当前一个历史条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其影响包括三个层面：在全球层面，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在地区层面，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在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增长低迷而日趋严峻。由此看来，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原因可以分为国内、地区 and 全球三个层次。

□ 韩爱勇

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国内经济原因

从国内经济层次来分析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美国表现的最为明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曾做过这样的统计：2016年美国全职男性雇员的收入中位数低于42年前的水平，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说，找到一份能拿到足额工资的全职工作也越来越难。位处收入分配底部群体的实际工资，依然停留在约60年前的水平。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60年中表现良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6倍，但是在大规模减税政策之下，这些增长成果落到了位于收入金字

塔顶端的一批人手里。其结果，从1971年以来，中产阶级失去了在美国社会中所占的多数，至2014年，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所占的比例是49.4%。反观之，0.1%的最为富有的家庭却拥有了90%的财富。这种财富格局，一方面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西方发达社会那种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为拉长的“水滴型”社会结构，少数人握有大量财富，占据了财富版图的金字塔顶。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变带来社会多数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不满精英统治，改变国家治理现状，改变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资源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呼声。

美国财富版图的这种转变究其根源，还在于财富的产生方式。概括来讲，资本和劳动是产生财富的两种方式。但在信息化的今天，这两种财富产生方式创造财富的边界并不一样。就个体劳动者而言，大到极致每天只能劳动24小时，且不可持续，因而劳动产生财富的边界是有限的。但是，资本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随意流动，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不眠不休地产生财富。如此一来，劳动和资本两种产生财富方式导致了“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财富积累分化。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更增加了资本产生财富的规模，加剧了财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产生更为悬殊的两极分化结构。华尔街因为精英治理的放纵而成为民众反对精英统治的最大靶子，其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

客观地讲，美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并非始自今日，但今天的经济环境却加剧了财富的两极分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这对于任何外向型经济体而言，都以为将国内财富分配蛋糕做大的难度加剧了。由此就看到，一方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用来分配的财富增长速度严重低于了两极分化增长的速度，其结果是固有的两极分化在这个时间节点被空前放大了。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不信任精英统治，“求变”成为普通民众的第一诉求，至于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则是第二个问题。当特朗普在大选中将议题聚焦于经济领域时，登台一呼，应者蜂起，也就成

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地区经济合作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从地区合作的视角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很多英国民众对脱欧持赞同观点。欧盟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来逐步统一了各成员国的货币，推出新的国际流行货币——欧元。但是，欧盟始终没有统一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这就为经济状况尤其是财政状况不太好的成员国，借助于欧元这一国际硬通货的信用来发行国债从而维持国内的财政运转提供了可乘之机，其结果导致国家的债务与国家的财政状况相脱节。当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债务危机由此而始。2008年特别是2009年以后，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等被称为“欧猪五国”的成员国相继发生国家债务危机，原因也在这里。

坦率地讲，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英国虽然经济持续低迷，但始终没有恶化到发生国家债务危机的程度。这一方面得益于英国经济的基本盘保持了稳定，另一方面跟英国没有放弃英镑也有一定关联。正反两个方面的考虑，使得部分英国民众得出这样的判断，欧盟的养猪行为拖累欧洲和英国的发展，加入欧盟不仅使英国没有获取预期的经济收益，反而有受到牵连之虞。这就使英国人产生这样的认知：与其是组团养猪，倒不如自家过日子更为放心和省心。

从欧盟运行程序看，欧盟拖沓、无效的决策机构与英国所承担的费用完全不成比例，也加剧了一些英国民众对欧盟的抵触心理。以欧洲议会为例，欧洲议会共计有785名议员，英国占据78席，绝对数量并不少，但相对影响力（即，欧盟内各国选民相对影响力）只有1.08，在25个成员国中位居倒数第二位，仅高于德国的1.00。和从欧盟获得的津贴和财政退款相比，英国每年需多向欧盟缴纳近90亿英镑。政治决策的低效、极低的相对影响力再加上高额的缴纳费用，使得很多英国人认为，对欧盟的无效投资是在白白浪费纳税人的

钱，不如将之投入到国内更为需要资金的领域以提高国内就业、医疗教育和国民福利。

这两种心理认知，成为很多英国人执意要与欧盟分家的根源。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乡村和边远地区，这种心理更为普遍。

全球化对传统依附理论的修正

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依附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其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世界也就呈现出发展与落后的两极分化格局。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大批发展中国家借全球化之机利用后发优势展现出了远超过发达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潜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至2010年世界财富版图出现变迁，东方国家拥有的财富自16世纪以来首次超越西方国家。财富格局的变迁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一些民众包括精英阶层认为，全球化虽然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发展，但其收益远没有达到预期，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更是出乎这些人的预料。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状态，也在修正着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判断。欧美国家的财富格局已经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群体和阶层都在全球化进程中收益，工薪阶层与边远地区的发展和财富积累速度远远滞后于资本持有者和中心城市。这样一来，在发达国家内部又形成了一个“中心—外围”财富分配结构。外围的阶层与地区也就成为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聚集源。

战略视角

二

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曲解与选择

在他们看来对其实现战略目标有利的美日主导的既成秩序，以“先进民主国家”之姿态维护地区安全，抵制并抗衡中国在东亚形成主导地位。若安倍晋三能够第三次当选日本首相，则其任期将最长延续到2021年9月，期间若无重大国内外变故，其亚太战略顶层设计应该不会出现本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基本上不会主动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上易被安倍内阁以及保守势力和媒体所利用，进行先入为主的负面宣传。而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日益封闭与保守，通过舆论反过来加强日本决策层、精英层对华偏见，使得日本难以从合作角度来理解和接受“一带一路”倡议。但就多边金融、经贸合作而言，日本各界精英仍有其自主判断力和立场，不过在目前保守势力占优的环境下，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另外，日本决策层极力坚持其认定的原则，利用各种内外条件实现既定政治目标，根本上缺乏灵活变通，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应对方案。面对日本决策层和保守势力反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执念，我们一方面从稳定中美关系，拓展和夯实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等外围关键因素着手；另一方面则需主动探寻和构建面向日本公众、学界、精英界有识之士的多元沟通渠道，通过对话、交流、人员往来以及共同研究，有针对性地推广“一带一路”和平发展倡议。

热点透析

“舒尔茨效应”是指舒尔茨担任社民党主席以及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以来德国社民党呈现出来的积极发展态势。这一积极发展态势尤以2017年2月份和3月份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舒尔茨受欢迎的程度一度超过了德国现任总理、基民盟总理候选人默克尔。与此同时，社民党民调支持率不断攀升，一度反超联盟党，新增党员人数达到13000名。一时间，德国政坛刮起了一阵“舒尔茨旋风”，2017年德国大选也开始变得扣人心弦。

然而，好景不长，年初的“舒尔茨效应”并未持续发挥能量，社民党没能保持住上升的势头，连续输掉了三个州的议会选举，舒尔茨的支持率也大打折扣。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德国政坛“舒尔茨效应”不再？

一

2017年初“舒尔茨效应”的产生是在特定背景下多种积极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旦背景发生变化，积极因素发生变动，效应所产生的能量注定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特定背景是指社民党在年初较好地解决了总理候选人问题。

1月25日，时任社民党主席、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加布里尔宣布放弃代表该党竞选联邦总理，同时宣布辞去社民党主席一职。加布里尔的这一高姿态为他赢得了敬意，同时也团结了社民党。可以说“舒尔茨效应”的产生离不开加布里尔退位让贤的铺垫。2月12日，德国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德国前外长、社民党人施泰因迈尔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胜利，成为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出任总统并非默克尔的初衷，但无奈联盟党未能推出合适的人选，只能接受社民党的提议。在选民心中拥有高支持率的施泰因迈尔出任总统为社民党提振了信心，也为“舒尔茨效应”的产生积攒了人气。3月19日，舒尔茨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当选为社民党主席以及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效应”势不可挡。

然而，这之后加布里尔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外长的新工作之中，施泰因迈尔也不得不面对从社民党外长到超越党派的总统的转变。“三驾马车”合力产生的能量不再，舒尔茨需要单独挑起大梁。“舒尔茨效应”能否持续发挥效应愈来愈直接取决于舒尔茨个人的领导魅力以及社民党本身的竞选实力。

二

德国政党研究专家尼德迈尔教授5月24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舒尔茨不能仅靠缺少竞选经验的心腹恩戈斯以及社民党总干事巴尔利来组织竞选，社民党需要组建一个更好的竞选班底。经验的缺失导致社民党在很多重要的环节应对不足。例如，在5月22日竞选纲领的推出过程中就经历了一波三折，遭遇了一个“黑色星期一”，先是在日期上反反复复，后来又因可疑邮包的干扰，社民党总部被清场长达1个半小时，待一切恢复正常后，竞选纲领由社民党总干事巴尔利、联邦家庭部长施维布格以及社民议会党团主席奥珀曼予以推介，而非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德国媒体一时间惊呼社民党为何将党主席雪藏。要知道，不担任政府要职的舒尔茨和默克尔相比并没有太多在媒体露面的机会，此外由于不是联邦议会议员，舒尔茨也缺乏和默克尔直接叫板、公开辩论的最佳平台。竞选班底经验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与舒尔茨本人缺乏丰富的国内执政经验有关。

三

“社会公正”一直以来都是社民党的主打牌，今年舒尔茨也不例外。可是仅靠“社会公正”很难触动选民的内心。首先，德国良好的经济形势使得“社会公正”并非德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动荡的国际局势使得德国选民更加关注安全形势，期待政局稳定。而在安全领域，明显现任总理默克尔更容易有所作为。此外，随着默克尔对难民政策的调整，德国国内对默克尔不满的情绪也已逐渐平息。

四

联盟党和社民党高层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拒绝再度组成大联合政府。于是选择合适的联合组阁伙

德国政坛「舒尔茨效应」为何不再

□ 吴江

伴成为社民党的当务之急。社民党理论上可以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然而，绿党自菲舍尔的退出后一直缺少灵魂人物的指引，加之环保早已不再是绿党的专属领域，曾经叱咤德国政坛的那匹黑马风光不再。2016年12月8日，德国柏林市诞生了德国第一个由社民党人主导的“红红绿”政府。柏林是德国的首都，也是德国最大的城市，其组阁形式一直以来都对联邦层面的组阁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然而，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要想实现在联邦层面的执政面临很多挑战。“红红绿”的组阁压力主要来自社民党和左翼党的合作，要知道左翼党曾经是作为反对社民党的抗议党而成立的，一旦成功组阁，要么面临和社民党作出妥协，冒犯铁钎杆选民的 risk，要么持续和社民党作对，冒削弱政府执政能力的风险。

五

随着在萨尔州、石荷州以及北威州地方选举的三连败，舒尔茨和默克尔的差距越拉越大。州议会选举的失利更多的是社民党常年支持率低迷的结果，以及地方政治家在各自治理中暴露出的问题所致，有的甚至就是地方政治家的错误言行所引发。社民党发展面临的瓶颈是“舒尔茨效应”昙花一现的深层原因。

与基民盟相比，德国政党谱系的变化给社民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2010改革议程”使得社民党内部被撕裂，造成了许多固定选民的流失。绿党的崛起和左翼党的诞生从左側削弱了社民党的选民基础。基民盟在中间靠拢以及选择党的诞生又从右侧挤压了社民党的生存空间。两届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均沦为基民盟的小伙伴，更加导致难以在选民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2017年德国大选的日子日趋临近。作为一名在欧洲政坛成长起来的政治家，舒尔茨并未参与社民党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左翼党进行沟通。作为一名口才出众、性格外露的政治家，舒尔茨即使在大选后成为反对党主席，也应该能够把握机会，重塑自己德国选民中的形象，提升领导力。

毕竟，对社民党而言，赢得2017年联邦大选只是短期目标，提高党的凝聚力和行动力才是根本。

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曲解与选择

□ 朱丹丹

客观地说，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来看，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新秩序都会对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影响。而日本在二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中一直起着东部支撑点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无法绕开的关系国。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系列举措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日本如何根据变化判断利弊得失并作出政策调整和选择，我们如何冷静应对和把控局面，无疑是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解读

追求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试图改变所谓“政治傀儡”身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制定对外战略的一条主轴，安倍政府亦不例外。即使国内经济发展陷入迟滞，安倍晋三仍一方面推行强力改革，力求效果短、平、快；另一方面则将战略目标重点锁定在如何实质性地修改宪法，从法理层面替日本军事和国防力量松绑，为日本恢复政治、军事大国身份铺平道路。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安倍内阁在推行上述内外政策时，始终将中国视为一个假想敌。受到“中国威胁论”思维的严重影响，日本核心决策者很难从互惠互利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倡议。事实上，安倍内阁从一开始就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明显的警惕心和防范心理。

上述偏见有其深刻的历史、政治根源，也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出去”所引发的地区形势变化、美国亚太

战略的调整以及日本国内的保守政治思潮有关。这引致了决策层和保守政治精英层面在面对邻国总体实力迅速提升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和国际影响时，会对照自身情况产生不解、反感乃至恐惧心理。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落实到安倍内阁对华政策上，就是将中国视为政治和安全假想敌，曲解中国对外战略的扩张性和威胁性，且对新兴崛起国家与现有（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前景持悲观态度。这些深层次心理因素导致日本决策层无法冷静而灵活地从经贸互利、共赢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更不要说像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英国那样就事论事地接受和参与了。

这种偏见同时也反映在日本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系列报道与分析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经济发展经历持续低迷和动力丧失，日本政府 and 民间都在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新保守主义和新民族主义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想倾向，历届日本政府也有意迎合以及利用这种情绪。日本主流新闻媒体由于与政府具有体制和利益上的捆绑，其新闻报道的中国形象以及涉华新闻报道和分析一定程度上成为日媒传递民族主义情绪和宣传政府态度和立场的“重灾区”。考虑到上述情况，日本目前缺乏主动调整对华偏见的政治、社会环境及内在动力。

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选择

就日本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是否应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主动进行合作的问题，日本各界出现了与安倍政府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日本拥有相当程度的富裕资金，若能积极促进亚投行与美日

主导的亚开行合作，同时与中国和其他域内外国家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确是互利共赢的好事。

正是基于对亚投行较为理性的认识，在东南亚各国和英国申请加入以及法德意纷纷表态加入后，日本各界要求政府变更方针的声音高涨：“为了基础设施项目走向海外，参加是明智选择”“为了实现公正运营应该参加”。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拖延战术，表示正与同样持慎重立场的美国交换信息并商讨应对措施，今后可能会调整政策。

事实上，从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持一贯立场来看，日本政府借助美日共同立场来压制住国内舆论，从而推进既定政治方针的意图颇为明显。

为了借助美国力量，确保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能够在国内顺利通过，安倍内阁紧锣密鼓地在国内扩大在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规模计划，同时承诺未来五年提供约1100亿美元，为亚洲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安倍晋三强调，凭借在节能技术和可靠公共交通系统领域的长期经验，日本可提供高质量的项目，而这正是之前中方所认为中日在推进亚投行方面可以合作的领域。至此，安倍政府算是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出了明确的政策选择。

出人意料的是，国际形势再次发生变化，特朗普上台前后，日本决策层一度在心理上受到相当大的冲击，拒不接受和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全力辅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系统化的安倍内阁在经历了担忧与不安后，自2016年11月至今，安倍晋三数次访美，力求稳住美日同盟关系。同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贸与外交措施，来守住